

文化研究与中国问题

WENHUA YANJIU YU ZHONGGUO WEN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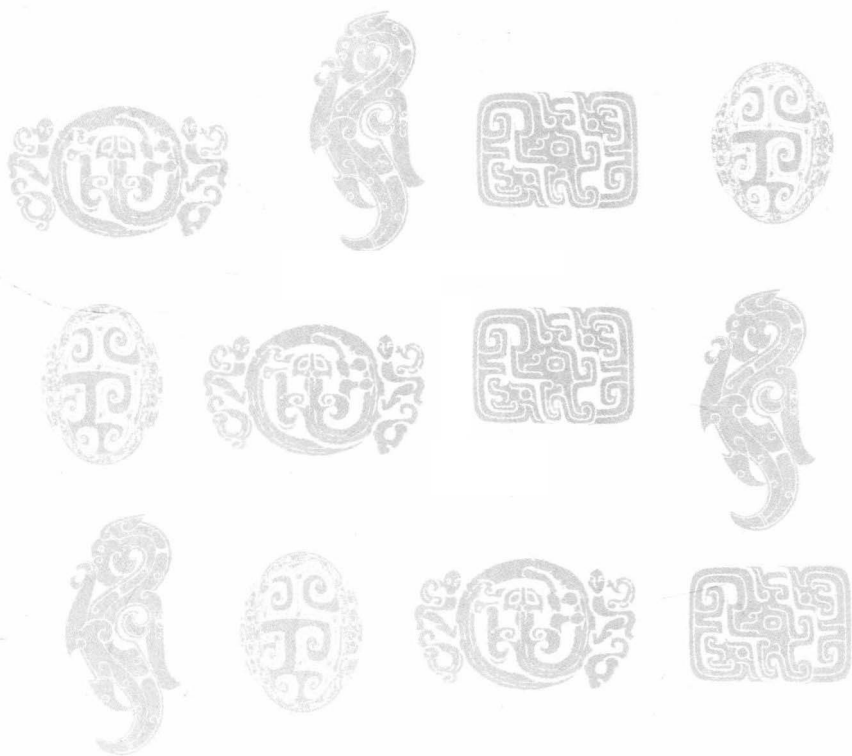
王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文化研究与中国问题

WENHUA YANJIU YU ZHONGGUO WENTI

王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与中国问题/王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ISBN 978-7-5426-5604-9

I. ①文… II. ①马…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0946 号

文化研究与中国问题

著 者 王 伟

责任编辑 钱震华

装帧设计 魏 来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jpc1932.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江苏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228 千字

印 张 21.25

书 号 ISBN 978-7-5426-5604-9/G · 1429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为文化研究一辩	5
第一节 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5
第二节 文化研究陷入困境了吗	15
第三节 中国问题、理论旅行与原创焦虑	28
第四节 何谓文艺学论争的“中国问题”	40
第五节 后殖民理论：持久的警示与严峻的挑战	51
第二章 当代文化症候举隅	73
第一节 冲击与博弈：文化研究视野下的经典教育	73
第二节 审美范式的变迁与忧思	91
第三节 娱乐文化、身体展演与意义编码	109
第四节 能指过剩：表意实践与文化症候	122
第五节 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与启蒙再造	131
第三章 大众文化的两大主题：身体与历史	141
第一节 身体、美学与政治	141
第二节 网络、狂欢与性	159

第三节 众声喧哗中的“扫黄”	167
第四节 历史叙述的限度	189
第五节 历史的结构与权力	195
 第四章 大众文化的五副面孔	209
第一节 “屌丝”:承认的政治	209
第二节 “土豪”:后革命的复归	216
第三节 “女汉子”:多义的建构	224
第四节 “杀马特”:尴尬的表述	243
第五节 “暖男”:易碎的完美	258
 第五章 余论:知识分子的焦虑与担当	267
第一节 底层表述的焦虑与反思	267
第二节 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	274
第三节 媒体文化与传媒教育	282
 附录1 脆弱的道德榜样	293
附录2 社会分裂的症结	299
附录3 集体记忆、苦难美学与文学品格	309
 参考文献	319

绪 论

文化艺术、文化课、文化人、没文化真可怕，如此等等，这些对文化一词的使用无不带有或显或隐的精英主义色彩，隐含着或强或弱的等级意味。实际上，精英式文化观恰是阿诺德、利维斯等人念兹在兹的主题。在他们眼里，文化是标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与普罗大众那种原始而未受教化的无政府状态迥然相异。文化的高雅、精英取向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那里更是得以发扬光大。直至今今，它仍然拥有庞大的拥趸。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文化研究着力对抗文化的精英主义观念，奋力将其拉回滚滚红尘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此一来，文化从高高在上变得能够紧接地气，从而迎纳了之前被排除在外的诸多经验。于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文化成了生活的全部方式，成了平平常常的实践。无论霍加特、汤普森与威廉斯等文化研究的先驱之间存在多少不同，他们都把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化——置于人类学的宏大视野下进行审视，都拒绝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而转向考察文化生产自身的逻辑，考察男男女女繁复的表意实践。由于权力与意识形态深刻形塑了意义生产的格局与细部，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中分析的关键环节。尽管文化研究每每作谱系学式的辨析，诉

诸历史,但这种回到特定历史场景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介入当下,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化研究的确堪称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当然,那些悲壮地固守“文学性”而对文化研究横眉冷对的学者往往没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文化研究并不拘囿于文学的一方天地,而是打破了人文学科的界限,启用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截至目前,文化研究早已成了一门显学,甚至成为不少高校的专门系所。文化研究虽然是舶来品,但从其理论旅行至中国伊始,就有一些学者运用它来剖析纷繁复杂的中国问题,涌现出一批可圈可点的学术著作。实际上,当年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学界并迅速流行开来,就跟学界有意借助它来讨论其时的文化状况直接相关。尽管如此,文化研究仍然招致从未消歇的批评,除了“憎恨学派”之外,现今有一种强劲否定意见指向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域外理论群体,认为它们都是导致中国文论失语的罪魁祸首。问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能否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以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去拒斥任何外来的理论资源。我们当然要努力创建具有中国气派的文论话语,但这种创建绝非闭门造车。它既要吸收中国古典文论的营养——众所周知,它也受过西方佛教的影响;同时也要承继现当代中国文论的成果——它正是域外文论与中国语境相互结合的产物;并持续借鉴外来的不断更新的人文理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表述人们耳熟能详。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证明,仅仅靠记诵马克思主义而不知变通就不免总是跌跤,而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最终取得革命的成功。因此,关键不在于理论的来源地,而在于是否将其跟中国问题相

互结合,能否有效地阐释中国现实并出示启人的洞见,从而刷新男男女女对于大千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另外,即便是那些现在看来不那么有效的理论预设,也没有必要予以全盘否定,而要弄清它究竟是在何种历史语境下提出的,对其合理性的一面及其曾经的风光无限做到心中有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文学作品如此,文艺理论亦如此。易于明白的是,理论家族的组成十分复杂,讨论某一流派文论的前提是通读其理论家的代表性著作,钻进去且理清其脉络,而非仅只具备一些走马观花式的印象,或耳食一些文论教材的一般性介绍。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妥善处理好文化研究全球化与在地化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富有挑战性的题目。文化研究固然要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这是下一步工作的基础。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攻玉”,讨论本土的文化问题,本书希图在这个方面做些尝试。针对学界有代表性的质疑文化研究的观点,第一部分展开针锋相对的辩护,由此讨论中国问题、理论旅行与原创焦虑之间的关系,并以后殖民理论为例凸显理论与本土结合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探讨当代文化的一些症候,譬如,在文化研究的冲击之下,经典教育的位置又在哪儿?当代的审美范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又引发哪些令人担忧的弊病?娱乐文化无孔不入的时代,能指过剩成为意义编码的突出特征,身体展演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大众文化乘着后现代主义的东风如火如荼地生长,它在导致蒙昧的同时有否夹杂着启蒙的点点星火?第三部分集中研讨大众文化的两大主题——身体与历史。关于前者,先是从理论上分析了身体、美学与政治的关系,继而剖析了网络上的身体景观所蕴

涵的复杂权力关系。关于后者,通过批判历史表述的不良现状与错误的历史观,强调应认真把握历史叙述的限度问题。第四部分以近年来广为流行的词语为例,譬如“屌丝”、“土豪”、“女汉子”、“杀马特”、“暖男”等,剖析大众文化的五副面孔。第五部分探讨媒体文化异常发达、多元文化交错共存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表述他者时的焦虑与反思,以及作为“阐释者”而非“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自己的担当。

第一章 为文化研究一辩

第一节 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十多年前,有学者因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学批评写过悼词而名动一时,可堪与之媲美的是这几年闹得正欢的给中国文学分别“唱衰”及“唱盛”的“垃圾论”与“高峰说”。这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尽管达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实则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利奥塔“向总体性开战”的呼吁传播已久,很多时候不少学者仍然钟情于宏大判断,而不愿意简单地往前再走哪怕一小步,认真地做些具体分析。久负盛名、让人仰慕的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①一文不幸亦有此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致命缺陷在于自打引入中国学界一直到现在都执迷于理论探讨,没完没了地研究那些本该三言两语了断的论点与方法,不去进行具体的实践分析,因而理所当然地走进了死胡同。因此,只有从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才能走出尴尬的困境。这个判词与对

^① 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第5—13页。以下谈及该文不再另注。

策看起来义正词严、合情合理,问题是与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现状太过隔膜,做出的指斥抛开了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无的放矢。

一 “文化研究”不能本质化

跟那些定义明确、界限分明的学科或研究方法相比,文化研究明显有些另类:它既涉及文学,也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法学等专业的知识与研究方法。也即是说,无论是研究视野、材料还是取向,文化研究都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力。谈及何谓文化研究时往往言人人殊,因为它有不同的来源:或接受葛兰西“文化霸权”说的影响,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接受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受到伯明翰学派的启发,或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启示,或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启迪,如此等等。而且,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并非都集中于文学研究领域,其他学科的从业者也大有人在。这就使得文化研究五花八门,风格各异,很难精雕细刻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完美定义。其实,真正在第一线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不以提炼出一个定义为要务,定义的缺乏对他们的研究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甚至可以说文化研究最为反对定义,因为它“通过超越学术专业化,避免了研究定义标准的划分”。^①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些年来,我们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讨论的都是‘什么是文化研究’,试图对它做一个确切的界定,列

① [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出个一二三四,似乎做到了这一点就大功告成了。”就是说,十几年来,中国学界一直纠缠于给文化研究下定义,其余一概不管。这要么归咎于国内学人的愚钝与固执,要么只能归咎于该种说法的言过其实。反对在定义文化研究上耗费过多的精力,我们同意这一点,但对于学界那么长的时间仅仅闭门探究了这一问题的不敢苟同。

定体虽无,大体须有,那么,理论家如何理解文化研究呢?“‘文化研究’并非时下流行的泛文化研究,而是指我国文学、文艺学领域受西方文化理论思潮的影响而开展的文化研究。”既然认为中国的文化研究发生在“文艺学”的地盘,又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那么,文艺学的扩容问题——研究对象不再囿于文学经典同时也包括与之相对的大众文学与更广的大众文化——就理应进入考虑的范围。所以,不仅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还有《红楼梦》中的饮食、发饰、化妆、女红等日常生活乃至其中的同性恋都成了研究者的盘中餐;不仅是《红楼梦》,还有时装、流行歌曲、洗衣粉广告、武侠电影、网络段子、网络“恶搞”等也是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令人疑惑的是,能否将后者统统归入“泛文化研究”而关在文化研究的门外?认可了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趋向,怎能再给这个开放的旅程人为地设置种种障碍?又能否将所谓“泛文化研究”与文艺学领域的文化研究截然分开?

尽管理论家也口口声声说文化研究并无边缘清晰的外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将其本质化。这种把文化研究本质主义化的另一表现是将理论排斥在外,断言文化研究的宗旨为“实用性”,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搞得剑拔弩张。有意思的

是,当理论家谈及文化研究时肯定性地引用了伊格尔顿:他“径直就把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至世纪末的这几十年,都笼统地称之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应予指出的是,伊格尔顿这里采用的是“文化理论”一词,回到《理论之后》的语境,这里牵涉到一批卓有成就的理论大家,譬如拉康、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布迪厄、德里达、杰姆逊、萨义德等。^①姑且同意伯明翰学派的立论和方法“就那么几个要点”,把其内部成员的差异撷在一边,问题是,面对这些学者的诸多开创性著作,还能不能草草结束战斗?要不要、应不应该有一部分研究者花费足够的精力深入钻研他们说了些什么?“理论之后”绝非意味着我们可以昂然返回没有理论的天真乐园,伊格尔顿的提醒言犹在耳,那么,就算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实用性,它拿什么来进行实践分析?如果离不了理论这个前提的话,有一部分学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深感兴趣就顺理成章。不妨说,文化研究有两大部分:理论的与实践的,或者理论资源与实例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理论—实践两者之间做出区分时,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大致的二元对立,既不能把这种关系僵化,也不能在它们之间无谓地做出谁更重要的取舍。

二 中国的“文化研究”缺少实践?

理论家言之凿凿:文化研究原本是“实践问题”,这是“必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 1 页。

须做的正经事”，但学界却在“理论问题”上啰嗦个没完，荒废正业。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宏伟的判断却仅有两条单薄的依据。其一，阿拉克教授点评中国学者文化研究的文章时，认为其中大多数都只是有关理论本身的争论。问题是，这个1997年的意见现今是否还能站得住脚。“依然是乏善可陈。”不难想见，十几年来众多学者文艺研究的大量成果都被一次性格式化。其二，有学者访谈霍尔时想在理论上有所借鉴，而霍尔强调要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位具有理论性情的学者不免失望，理论家由此大发感慨：“把一个原本就是实践的问题，自作多情地当成理论问题”，照这样搞文化研究不入死胡同才怪。既然霍尔认为自己只是运用而非生产理论，那么，想从他那儿得到理论上的经验多少有些所遇非人。不过，霍尔还只能代表文化研究中的一种类型，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导向文化研究全部都是实践问题的结论，更不能由这一位学者的理论趣味而断言我们的整个文化研究已然死路一条。否则，不是以偏概全又是什么？

正面列举文化研究的实例易如反掌。文化研究传入中国不久就涌现出第一批重要成果，即李陀主编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其中包括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1999）、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1999）、王晓明主编《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2000）、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2000）、南帆《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2001）、包亚明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2001）、胡大平《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2002）、陈映芳

《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2002)、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2003)、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2003)。这些著作显示出对中国文学与文化问题的及时关切,分析的焦点是它们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参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生产。它们也不是单纯地列举事例,而是重在对实例、现象进行解读,剖析其何以如此的诸般因由。

近年来,当代文学的制度研究成为热点,它突破了“拨乱反正”后针对极“左”文学观念的审美主义,力图把文学重新置入广阔的社会场域中进行评价,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文化研究路数,因为它重在铺陈文学是如何被动态的文学制度及其复杂的机制生产出来的。这方面的代表论著有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李洁非与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等。

就笔者目力所及,其他比较值得介绍的文化研究案例有戴锦华、崔卫平的影视解读,譬如,《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我们时代的叙事》(花城出版社,2008)等;著名乐评人李皖对中国当代音乐的谱系式梳理,例如《过了二十年,无人来相会》(《读书》2010年第3期)、《解放(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六十年三地歌”之一》(《读书》2010年第11期)、《民歌嘹亮(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六十年三地歌”之二》(《读书》2010年第12期)等;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当代文化研究网”开设的“社会分析”、“时事焦点”、“教育透视”、“三农问题”、“城市研究”、“媒体研究”、

“经济纵横”、“文学研究”、“思想史论”等板块刊载的栏目文章^①；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杂志上登载的一些在文化研究方面很有分量的论文，诸如丛小平《师范院校与中国的现代化：1897—1937》（2010年第1期）、魏伟《从符号性灭绝到审查性公开：〈非诚勿扰〉对同性恋的再现》（2010年第2期）、孙沛东《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2010年第6期）、赵月枝《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2010年第7期）等等。以上还只是大陆学界的，如果算上中国港台地区的文化研究实践，更是数不胜数，譬如台湾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文化研究》学刊、各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及课程等，香港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及《二十一世纪》等。

从以上所列例子容易看出，文化研究面对的是我们生活的大千世界，它借助话语分析展开看似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何以建构的程序与细节，避免不明就里的愚昧与盲目的膜拜。因此，文化研究可以逐步溢出纯粹学术圈的探讨，运用理论对公众熟悉的事例深入评点，从而不断地刷新男男女女看待世界的方式，这当然是已经在路上的更大规模的实践了。

三 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宽泛地说，中国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文化热，譬如文化寻根使得地方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门重新打开后急切走向世界的心理驱动着

^① <http://www.cul-studies.com/>

对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批量译介。而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始于 90 年代末期,随着市场经济与商业意识的迅速崛起,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日常生活、集体无意识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转型,文学理论也是这种大转型的积极参与者。面对人心不古、拜金主义的日益风行,知识精英们人文精神的倡导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现实与文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单一,而是趋于分层化、复杂化。伴着相关翻译的进入,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很快成为知识阶层解释世界、介入现实的一种表达方式,这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何以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后能够扎根并长盛不衰。而“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我们进入了一个由全球化的媒介和计算机技术带来巨大变化的文化环境。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分析当今全球文化产业中的政治经济因素、激增的新媒体技术及其产品,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①换言之,全球文化工业的冲击、读图时代的来袭、消费社会的降临与文化的物化使原本复杂的文化状况更加纷繁。此情此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漠然相向,躲进书斋,而应有所担当、有所作为。文化研究资源丰富、视野阔大,恰好能够提供施展拳脚的空间。因此,文化研究绝不仅仅是一种随风而逝的学术时尚,也不简单地限于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扩张与研究方法的重大更新,更重要的是它“能成为人们为理想的社会和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一部分”,^②因为它批评与政治

① [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 页。

② 同上书,第 32 页。